



重新迎来史诗的时代

□李松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重新提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命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史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诗歌体裁,全世界各个民族在形成的初期,都会产生出叙述民族起源、歌颂民族英雄的史诗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概念后来也从一种特定的诗歌体裁,发展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界,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开始繁荣之后,文学批评家在赞赏某些特定类型的长篇小说时,总会使用“史诗”一词来描述这类作品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史诗就成了文学批评家授予特定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勋章”,它表彰了作家创作宏大作品的雄心壮志、作品书写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的不懈努力以及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勇敢尝试。这也使得史诗式的创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作家努力追求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史诗这个概念对文学批评如此重要?为什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时刻,史诗有必要成为一种值得赞赏的文学风格和创作品格?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来谈中华民族的新史诗?这就不得不和史诗的美学特质联系在一起。美学上关于史诗的重要论述,当属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的分析。在黑格尔看来,史诗“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个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在谈到诗人与其作品的关系时,黑格尔认为史诗作者的“自我和全民族的精神信仰整体以及客观现实情况,以及所用的想象方式,所做的事迹及其结果”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黑格尔的语言听起来比较拗口,简单说来,他认为在史诗所讲述的情节背后,蕴含着“一个民族对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全部理解。而史诗作者从事的工作,就是与民族、时代及其所生活的世界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完美统一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作者写出的就是史诗”。

而特别强调文学作品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的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荷马史诗这样的史诗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与此类似的是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关于史诗的论述。在卢卡奇看来,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相对狭小,使得他们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充分地理解自己的世界,自由而熟悉地生活在其中。他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变故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未必是正确的解释),因而不会感到与其身处的世界发生齟齬。于是,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生活的总体性能够被古希腊人把握并加以描绘,由此就创作出了史诗。史诗中的人物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冒险、战斗,坦然地面对各自的命运,没有哀怨、忧虑,更没有对生活的反思。因为诗人、史诗所歌颂的英雄以及诗歌所描绘的生活世界其实是三位一体,彼此之间处在和谐统一的状态中。而这种整一状态,被卢卡奇命名为生活的总体性。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的文学批评界在向很多长篇小说派发史诗“勋章”的时候,有过于泛滥的嫌疑,似乎只要是那些具有较长的篇幅,在叙事时间上具有较大的跨度,取材于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事件的小说,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称号。但上述这些文体特征对于史诗来说,恐怕只是某些外在的、次要的条件,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作家、作品是否实现或近似于实现了对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的理解,是否达到了作家、作品、民族以及民族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等几个方面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显然,创造史诗对于作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甚至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美学史上,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卢卡奇,他们都意识到

黑陶《泥与焰》:个人历史也是地域历史

本报讯 2017年12月24日,“一个作家的南方微观史——黑陶《泥与焰》:南方笔记”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冯秋子、王开岭、周晓枫、黑陶等参加活动。

《泥与焰》:南方笔记》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是作家黑陶创作的一部关于故乡江南的散文集。在书中,镇江、湖州、浚边公路、后宅、古龙窑、蠡河、少年的寂静行走、亲人的清贫生活,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作家诗意地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南所发生的剧烈变迁。

分享会上,几位嘉宾分别谈了对这本书的感受,认为黑陶的散文具有浓郁的个人风格和辨识度,注重色彩和画面,体现了汉语之美和汉语修辞的魅力。“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南方个

《唐诗逸舞》艺术解读历史文化

本报讯 日前,由佟睿睿执导、青年舞蹈家唐诗逸主演的舞剧《唐诗逸舞》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上演。该剧以叙事、以事入体,以独特形式演绎唐诗之古韵,从传统文化中探索中国舞蹈的审美气象,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唐诗逸舞》由北京九舞金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造,2017年1月在北京首演,后在全国多地巡演,并获得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

的委约及孵化。全剧以三首唐代名诗作舞,从人影飘然、良辰美景的《春江花月夜》,到解读千古情缘的《长恨歌》,再到展现雄健刚劲之姿的《剑器行》,舞者通过高超精湛的舞蹈技艺和新颖的编排方式,以现代人的视角带领观众与历史展开对话。同时,该剧命名巧妙,唐诗逸是整部舞剧的编舞和主演,“唐诗”和“逸舞”又是该剧的两大主题,可谓独具匠心。

(王 竟)

这种作家思想与民族、时代、世界之间完美匹配、和谐的状态很难维持。黑格尔指出:“史诗既然第一次以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意识,它在本质上就应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混沌状态中觉醒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在这里,黑格尔把史诗理解为一个民族产生了最初的自我意识,但宗教、道德、政治等一系列律法尚未健全时代的产物。一旦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个人的情感、意志、世界观就会与作为整体的民族发生冲突,其作品也很难与民族、时代、世界保持和谐统一的状态。于是,史诗这一文体随之衰落,使得强调书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抒情诗、侧重于表现外部世界的戏剧体诗最终代替了史诗。

沿着黑格尔的思路继续发展,卢卡奇同样认为史诗中那种个人与民族、时代、世界和谐统一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存在,并特别指出了长篇小说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活世界已经大幅度地拓展,这就使得现代人再也无法像古希腊人那样完全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而世界也因为无法被现代人理解,开始向人类展示出自己陌生、神秘、恐怖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总体性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作家在作品中只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活本身,更不可能真正描绘出生活的总体性。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就是现代生活的史诗,虽然现代作家已经不可能真正把握生活的总体性,但由于他们将广阔、复杂的现代生活收束到文学文本之中的努力,使得长篇小说充当了与史诗类似的功能,最终表达了作家对于总体性的渴望与追求。

因此,史诗这一文体的本质,就是在民族的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历史阶段,对于民族自身、时代以及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史诗的作者其实就是民族的代言人,他要展现出自己那个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在整体上把握生活的总体性,并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与世界。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去书写史诗,必然面对着某种悖论式的情境。一方面,我们身处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神秘,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很难在总体上把握它、理解它;另一方面,书写史诗的作家无法真正获得总体性,也不可能真正完整地理解生活,他们只能勉强通过文学创作获得把握总体性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高度评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试图在无法真正获得生活的总体性的情况下,努力在文学书写中尽可能把握总体性,触摸时代、生活的本质,并为这些无法把握的东西赋予文学的形式。因此,每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都是悲剧英雄,他们不得不在生活如此复杂、世界无从理解的时刻,写出自己民族的自我意识,并勉力把握自身所处的时代与世界。而史诗这一称号也就成了对这一决绝的努力最好的褒奖和认可。

在文学史上,每当一个民族面临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刻,史诗式的作品就会出现。我们不必谈论19世纪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之于法国社会、托尔斯泰之于俄国社会的意义,只要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就可以明白史诗对于民族自我理解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是,这样的历史时刻呼唤着文学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书写,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与方向。此时,我们的前辈作家也回应了他们的使命,努力谱写出了新的史诗,如柳青的现实主义杰作《创业史》。在柳青对蛤蟆滩社会生活的书写中,人物命运的起伏、情节发展的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乃至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都高度吻合。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柳青在那个时代写出的中华民族对自身命运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写作当然是剔除了历史复杂性的,只是抽绎出柳

青对历史大潮的理解。因此,在今天回望柳青的写作,我们会发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按照一种理念的设想得到了妥善安置,无论是姚士杰、郭振山这样的反面人物,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都不足以威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使得柳青小说中的叙事语调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样的叙事缺乏复杂性,但毕竟构成了那一代中国人对于自己命运、对于国家前途、对于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位置的理解。因此,柳青的《创业史》堪称当代史诗,是尝试在作品中把握生活的总体性的典范。

不过正像黑格尔、卢卡奇所描述的美学史发展趋势,生活本身会不断释放出复杂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与民族命运的整一状态最终也会解体。80年代以来的文学就是不断释放出生活的复杂性,不断挖掘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不断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个人与集体、民族命运相疏离的历史。于是,中国文学有太多的作家乐于承认生活的不可知性,不承认存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时代的脉搏、生活的规律也就成了某种陈旧而可笑口号。在复杂神秘的生活面前,很多作家放弃寻找规律和总体性的可能。

而今天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来临之后,中国人必须重新对我们的民族进行历史定位,在新的坐标下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前进方向,以及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如果说黑格尔指出史诗诞生的年代恰恰是民族新的自我意识刚刚觉醒,而生活的复杂性又尚未完全展开的中间时刻,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也恰恰重新迎来史诗的时代,历史又重新呼唤着文学再次担负起书写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使命。如果我们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那么中国作家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应该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应该能够将个人的命运对接于民族的命运,把个人的困惑上升为公众的议题,使对个人复杂内心世界的探究转化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只有这样,文学才有可能超越小圈子,重新成为对公众具有感召力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我们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这种理想中的中华民族的新史诗应该具备哪些特征。首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所描绘的应该是关于中国的故事,反映新时代的生活,建构出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文学形象。不过光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2000年以来,世界最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崛起。这也使得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中,不断涌现出各式各样,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不同立场来书写的中国形象。因此,这就引出了理想中的史诗的第二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基于中国本位、中国立场的。正像前面所说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的书写,代表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因此,我们期待的中华民族新史诗必然是民族本位的,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来阐释中华民族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的形象,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第三,每当谈到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时也就是一种误解,似乎这样的作品所描绘的事物仅仅属于中国,是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的东西。但史诗实际上有个特点,它表面上只是写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但由于在史诗中,民族的思想意识与民族所生活的时代与环境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使得史诗中民族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同时也是世界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民族史诗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将只属于本民族的、特殊性的东西,书写为具有普遍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新史诗既是要提供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解、自我形象以及它的前途与命运,也是在为世界立法,为世界历史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文艺支教走进吕梁山区

本报讯 受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委托,日前,中国传媒大学和太原师范学院师生赴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田家会小学、上楼桥小学、前马村小学开展文艺支教活动。

参加活动的中国文联协理委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以及薛晋文、陈友军等为山区孩子

们呈现了音乐课、书法课、英语口语课、影视鉴赏课等多门课程。孩子们在课堂上互动积极,收获了新鲜的文艺知识和美好的记忆。文艺志愿者团队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大家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对基层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辛 雯)

舞剧《运》弘扬运河文化和民族精神

本报讯 1月1日至2日,由北京物资学院出品的大型原创舞剧《运》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首演,以艺术的形式传承弘扬了运河文化与运河精神。

《运》由北京物资学院历时近两年创作而成,并成为唯一一个由非专业艺术团成功申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项目”的剧目。该剧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号子”作为符号和线索,将视角聚焦于运河岸边的寻常人家,展现了从清末到进入21世纪贯穿四代人的经历和故事。《运》由许锐编剧,帅晓军执导,汪子涵、邵俊婷、蒲宇等主演。担任群舞的都是来自北京物资学院非舞蹈专业的大学生,他们的舞蹈技艺通过该剧得到显著提升。(范 得)

中国戏曲学院加强昆曲人才培养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戏曲学院日前在京举行的本科招生推介会上获悉,2018年该院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530人。为满足北方昆曲剧院、北京演艺集团的人才需求,该院将招收昆曲班和北京曲剧班,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地方剧种数量进一步扩大。

据悉,此次是中国戏曲学院首次招收昆曲大班(包括昆曲表演35人、昆曲器乐伴奏8人),表

明学院更加重视“百戏之祖”昆曲人才的培养。该院还增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致力于剧场管理人员的培养,这是该院首次招收非艺术类专业。同时,为鼓励更多考生投身于戏曲作曲行业,该院将推进戏曲作曲招考方向的考试改革。此外,中国戏曲学院多个招考方向今年将继续执行免学费政策,包括京剧表演和器乐、昆曲表演和器乐、多剧种表演和器乐、戏曲作曲等。(王 竟)

读杨光祖的批评文集《批评的思想之光》(作家出版社2017年),犀利透彻的语言风格、富有逻辑的推理表达、深具才情的艺术直觉贯穿文集始终。正如文集的名字“批评的思想之光”,每一篇文章都散发着独特的思想气质。

一位批评家的“艺术直觉”是其批评生涯的命脉所在。这需要批评家具备深厚的人文修养和学识修养,才能够抵达其理想的精神高地,才能更好地去剖析优秀的文学作品。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批评中的一切文艺理论都是为艺术家的“艺术直觉”服务的。如果一位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能力缺失,那么他又如何能够进阶到对文学作品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这一上升阶段呢?在复杂的文学文本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文学批评家的天职之一。杨光祖的“艺术直觉”是敏感的,他的文学批评大多都是先“感性”后“理性”的,层层递进,不断剖析。他的文学批评是鲜活的,立体的。他看得到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更体会得到作者在创作中赋予文本的真情实感。

一位好的文学批评家,不仅需要敏感的“艺术直觉”,而且也亟须扎实的文学和哲学理论功底。杨光祖的批评文章为什么有力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思想的力量。他喜欢哲学,对中国古典哲学是下了功夫的,对西方哲学也阅读甚广。由于这种哲学的素养,使得他的批评有了一种他人所不及的思想穿透力。他总是见人之未见,也总是言人之未言。比如,他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批评,虽然过去了十多年,还让人读来心动。他对莫言小说的肯定和否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他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让很多人叫好。当然,这种思想力量也来自于他的经历,他出身农村,农村的生活经验让他可以看到那些作家写作后面的虚伪和矫饰。他坚守文学批评家“求真”的伦理底线,不断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将海德格尔、拉康、本雅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内化吸收,转化为自身批评写作的思想源泉。他能够很好地对文学艺术文本进行思想性分析,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每一句都散发着独特的“思想之光”,语言犀利,但有深度,引经据典,却不肤浅。他所呈现给读者“求真”的批评态度,都是其对文本自身进行生命情感体验的真实写照,都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思维感应。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除了深具思想内涵之外,随笔体的写作风格,是他文学批评又一散发光芒之处。他的文学批评不受学院批评的规训,使得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妙趣横生。在《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这部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一部成功之作,他对孙少平、孙少安这些青年农民的描写,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阅读过程中,我好像忘了我在干什么,忽然大笑,笑着笑着,就又哭了,眼泪涌上眼眶。要知道,我读小说还是很少被如此打动过。当然,一个原因是路遥写的是我熟悉的生活,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写的太好了。他虽然写的是庸常的生活,但这是伟大的庸常。我为路遥鞠躬,你写活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段文字是出现在一篇“正义言辞”的文学批评中的。如今,学院派文学批评写作,越来越得到大部分批评家的青睐,其文学批评中弥漫着大量拗口、看不懂的学术术语,技术主义至上、复制、粘贴,从而导致文学批评人文色彩的缺失和艺术精神的匮乏。在如此“善变”的批评环境中,杨光祖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与批评信仰,又何尝不是一种坚守。无论你赞同与否,他文章的批评语言依然能够深接地气,为读者留下了更多回味与理解的空间。

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纸质阅读虽然成为“边缘化”、“小众化”的审美坚持。但微信、微博等公众平台的订阅号推广,使得文艺批评获得更广阔地面向大众的空间,再一次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文艺批评思想力量的展现变得尤为重要,批评家所肩负的责任越发任重道远。正如杨光祖在《提升文艺批评的思想力量》一文中所言:“当代文艺批评家,急需加强自身的哲学素养,锻就自己的思想力量。如此,不仅文艺学术评论自身会赢得认可,更重要的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创作才会有真正的指导意义。”

——评杨光祖《批评的思想之光》

□张亨亭

世俗中的坚守

第三届“延安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第三届“延安文学奖”于日前揭晓,王哲珠的中篇小说《参与者》、孙庆丰的短篇小说《奔跑的猪》、雍措的散文《滑落到地上的日子》、孙晓杰的诗歌《诗歌的力量》、李萍的评论《文学的乡愁和心灵的返乡》、廖哲琳的随笔《信天游》和张伯龙的信天游体诗歌《梁家河》等27篇作品获奖。这些作品基本代表了《延安文学》2015至2017年度所刊发作品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或入选有重要影响力的年度选本。本届“延安文学奖”充分体现了《延安文学》近年来着力打造的不唯名家,不薄新人,只认作品的办刊理念。

“延安文学奖”由延安文学杂志社于2013年设立,旨在推荐文学新人,推出优秀文学作品,增强刊物凝聚力,促进文学事业发展繁荣。该奖已举办两届,从第三届起评奖时限改为每三年评选一次。

(高 权)

陆其明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华社军分社海军支社原副社长陆其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2月20日在京逝世,享年87岁。

陆其明,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水兵生活速写》,长篇小说《海》,报告文学集《大海的骄傲》《大海的战士》《大海的新歌》,中长篇报告文学《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中长篇纪实文学《海上猛虎》《中国海军常规潜艇部队成长纪实》等。